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四十九期 2003年3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49, March 2003.

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 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

夏曉鵬

The Localization of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the Case of “Foreign Brides Literacy Programs”

by
Hsiao-Chuan Hsia

外籍新娘、識字班、實踐式研究、行動研究、培力

Keywords: foreign brides, literacy programs,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action research, empowerment

*感謝所有參與識字班推動工作的伙伴，特別是宋長青、吳怡佩，釋自淳，吳靜如，沒有她們的投入，識字班無法日漸成熟。

收稿日期：2002年6月13日；通過日期：2003年1月7日。

Received: June 13, 2002; in revised form: January 7, 2003

通訊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email: hsiahc@ms11.hinet.net

摘 要

本文以作者實際策劃和參與的「外籍新娘識字班」為例，討論實踐式研究的理論、方法及其對社會研究的意義。文中說明如何運用「受壓迫劇場」(Boal 1979) 的理念及技巧，並轉化傳統研究方法，以培力 (empower) 主流社會的邊緣族群。同時，作者主張，實踐式研究能成就更深刻的研究成果，因為積極地參與社會改造過程，使研究者更能直接觀察與體會社會建構及其變革的機轉。

Abstract

Based on the "foreign brides literacy programs" the author has initiated and participat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 to social studies. It illustrates how the concepts and techniques of the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can be applied, with the use of transformed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to empower the marginalized groups. It is proposed that praxis-oriented research can achieve more sophisticated research results, because by actively involving oneself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er can observe and examine much more directly the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前言

筆者自 1994 年開始「外籍新娘」¹現象的研究，持續至今。多年來，最常遭遇的學術問題，不外是：「如何找到受訪者，並說服她們提供原本私密的經驗？」而我的回答永遠是，與受訪者的互動不是技術問題，這個研究本身即是一個社會參與行動，必須放置在一個更大的社會運動脈絡裏，才可以得到較完整的理解。

這樣的回答，在傳統強調客觀性的學術研究脈絡裡，顯得十分刺耳。然而，隨著實證主義在學術界不斷地遭受來自建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等思潮的批判，研究者的角色從「客觀中立」的桎梏中逐漸被解放出來，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反思自身研究的立場、正當性、對被研究者應有的回饋，乃至於研究者的社會責任等等問題。本文即嚐試藉著自身投入多年的「外籍新娘」研究為例，討論實踐式研究所涉及的認識論及方法問題。

研究的社會行動脈絡

由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徐正光教授所指導的一項研究計畫，我捲進了一場社會運動。這個計畫旨在研究兩個南台灣客家鄉鎮——高雄美濃與屏東內埔小商品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徐教授需要一個會講客家話的社會學系畢業生。從小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催眠養成下，剛畢業的我正熱衷於申請美國的研究所。中研院所提供的工作機會，我原本的打算只是可在申請表裏增加一項不錯的資歷。萬萬沒想到，這個投機的決定竟很快地改變了我的世界觀。

這項研究計畫裏的三個同事，鍾秀梅、李允斐與鍾永豐，反省當

1. 「外籍新娘」一詞為一般大眾所熟悉的用法，充滿了台灣人排斥第三世界婦女的心態，但為了讓讀者瞭解所指對象，因此仍勉強延用，特以括號標出，以示對其所蘊涵的意識型態的提醒。

時台灣社會運動的民粹主義 (populism) 化，正想辦法回到他們的故鄉，美濃；藉由徐教授所提供的助理工作，他們在都市化的熱潮中逆流而下，重返美濃。他們籌組美濃愛鄉協進會，經過多年的社區行動與動員，獲致了反水庫運動的成功，使一個枯萎的客家農村揚起了活力²。

這項研究與這場運動的參與過程，觸發了我心中久受壓抑的階級認同與客家認同；並見識了面臨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處境的農民生活，以及西化與個體解放潮流中的農村婦女困境。秀梅、允斐及永豐等人獻身草根運動的熱情使命深深地啓發了我。就讀於台灣大學時，各種對抗政治權威的學運正風起雲湧，思想裏總以為所謂社會運動就等同於政治鬥爭，直到與美濃這三位年輕的運動份子結成一個行動團體，我才領悟到向草根學習的重要性，而也是在理解客家農民生活各個面向的過程中，我們才注意到，台灣農村中的「外籍新娘」人口正與日俱增。當我開始思索博士論文的題目時，「外籍新娘」議題很快就被我納入考慮之列，與同志們討論之後，我們認為在菁英論述充斥的當前，有必要為被邊緣化的農民發聲，因此我決定寫這個題目。

「外籍新娘」議題雖有其敏感度，但經由長期的互動及參與社會運動，同志們與我早已與地方居民建立了深切的相互信任，由此親近我的研究對象自是水到渠成。在我進行研究之前，許多受訪者早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朋友，透過運動所建立的社會關係網絡，原本不認識的朋友也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存在。而我和她們的信任感並非靠諸如「進入」與「脫離」研究場域（例如 Shaffir and Stebbins 1991）的精細研究技巧，就可輕易建立；它來源於一個企圖為邊緣者發聲的集體行動與意識。

2. 關於美濃愛鄉協進會所領導的反水庫與社區運動，請參閱鍾永豐著「社會學與社會運動：美濃反水庫運動，1992至1994 (Sociology and Activism: the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1992-1994)」，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或查詢該會網站，網址：<http://mpa.ngo.org.tw>

「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實踐式研究歷程

筆者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便利用暑假返台期間開始「外籍新娘」現象的研究，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的田野以台灣男子與印尼女子的婚姻為主，一九九五開始逐漸包含來自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泰國等「外籍新娘」。這期間做了許多深度訪談、參與觀察，並二度前往印尼拜訪，同行的包括想探望印尼媳婦（仍在等候簽證）的父母，一位想與未婚妻會面的男子，一位欲相親的男子，以及他們的媒人。

這段與「外籍新娘」相處的過程中，我發現不會說、寫中文是她們日常生活所面臨的主要障礙，因此義務為一些我最親近的「印尼新娘」上中文課。幾次上課之後，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同志們就識字班作為社區運動的意義進行討論，決定將範圍擴展至全美濃的「外籍新娘」。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外籍新娘識字班」正式開課。識字班的經費由高雄縣政府的成人教育計畫提供，因而程序上必須由學校提出申請，美濃愛鄉協進會向當地一所國小的校長求援；由於先前的社區活動，這位校長已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發展出良好的合作關係。在當時，這個識字班是第一個且唯一以「外籍新娘」為主的課程，也因此引起了全國性，尤其是媒體的注意。

一九九五年八月我再度回美，一九九六年九月返台寫論文，九月十五日，美濃愛鄉協進會為識字班第三期的結業，以及我與「外籍新娘」的重聚舉辦餐會。這三期的識字班操作，並無法達到原先預想的培力目的，一年的課程下來「外籍新娘」仍相當害羞，鮮少在課堂中發言，學員之間仍相當陌生，甚至連彼此的姓名都不清楚，更遑論相互支援網絡的建立。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同志與我就如何以更有開創性的方法經營識字班進行討論，我們決定嚐試「受壓迫者劇場」(Boal 1979)的想法。鍾喬——詩人及民眾劇場工作者，受邀參與識字班第四期的課程。

經過這十次的工作坊，我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幾位女性成員進行

密集的討論，以「受壓迫者劇場」的精神及方法設計新的識字班課程，並於第五期識字班課程中進行嘗試與檢討而後有系統地設計出初級班課程和教師手冊。

一九九七年我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任教，並得到國家科學委員會連續三年研究經費的補助。我一方面持續觀察並參與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工作，另一方面經由研究助理的協助，將「外籍新娘識字班」擴展到其他地區。這段期間繼續進行深入訪談，對象除居住於美濃外，還包括了高雄縣其他地區，而受訪「外籍新娘」的原初國籍，除印尼外，還有越南、泰國、柬埔寨、菲律賓、緬甸等。同時我與研究助理及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工作伙伴，分別於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〇年間，一同拜訪了越南、印尼及菲律賓，一方面考察當地的社經發展，另一方面瞭解「外籍新娘」家庭的情況。這段期間，由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協助，進一步完成了中、高級識字班課程的教材與教師手冊。

實踐式研究作為持續不斷的運動的一部份

如前所述，此研究是作為我所親身參與的社區運動的一部份。因此，研究一開始便放棄傳統的客觀研究，而採取實踐取向，企圖為主流社會中被邊緣化的研究主體「培力」(empower)；而「識字班」是在實際瞭解「外籍新娘」生活狀況及最迫切的需求後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從行動當中更進一步發現對識字教育理論及方法的需求；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相互辯證，並非理論先行決定了實踐的方向。

拒絕物化研究主體

愈來愈多的社會學家與其它領域的學者，強烈質疑受實證主義影響的社會科學，將研究對象視為客觀的「物」，並對結合學術研究與行動(activism)產生了興趣。這種學術實踐的稱呼因人而異：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Argyris 1983)，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als-Borda and Rahman 1991), 參與式研究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ark 1989), 解放社會學 (liberation sociology, Feagin and Vera 2001), 以及女性主義行動研究 (feminist action research, Reinharz 1992)。這些研究方法是有些差異, 但對於實證主義 (positivism) 的看法都採取批判性的觀點。Boguslaw 與 Vickers (1977) 舉出了實證主義表現於社會學領域中的五項特徵：(一)預測性及解釋性知識的增加；(二)肯定現存的社會體制；(三)相信現實的客觀存在乃獨立於人的意志與意欲之外；(四)相信人可以找到一致性的法則, 並做出預測；因此, (五)唯有訓練有素的專家才有辦法從事這種專門、科學性的活動。

參與式傾向的研究者對於實證主義的批判一般聚焦於三方面：(一)實證主義的研究被利用為國家 (state) 的合理化工具；(二)實證主義有其意識形態, 因此絕非如其所聲稱, 是客觀而價值中立的 (value free)；並且(三)在主客觀的區別下, 社會世界的複雜度在研究過程中遭到化約。由於實證主義的研究通常是由國家或既得利益財團所資助, 而平民大眾只被化約成統計數字, 並被排除於重要決策過程之外, 因此參與式研究者相信, 實證主義的研究乃被用來維持現狀 (Hall 1979; Maguire 1987; Feagin and Vera 2001), 結果是強化了「一種單面向的過程, 視人民為資料來源, 認定人民只擁有片斷而局部的知識, 他們從不被期待也不被明確假定擁有分析既定社會現實的能力。」(Hall 1979:403)

傾向於參與式研究的學者基於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一致認為價值中立是個幌子, 最起碼, 「社會事實」(social facts) 不同於「自然事實」(natural facts)。不採取行動本身即是一種行動。因此, 參與者的價值、信念與感情對於理解社會是絕對必要的；個人的介入不必然會干擾研究品質, 甚至, 相反地, 它有助於提昇研究品質。

研究即實踐

進一步區分，有參與傾向的研究可分為兩種：一種強調個人與社會的改造，另一種僅著重於讓受研究者參與社會研究。本論文旨於前者，並將之稱為「實踐式研究」(Praxis-oriented Research)。筆者在此不採一般較常使用的「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例如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 夏林清 1996)，因為「行動」(action) 在社會學裡指涉「任何一組或一系列的社會活動或行爲……以及個人的行動。……這種活動是有意的或有目的的，而且經過自覺的考慮，而不僅僅是生物學上反射的結果。」(Jary and Jary 1998:5) 在這樣的意義下，「行動」並不必然涉及個人及社會改造。再者，「行動研究」原本強調「社會改變」和「民主參與」後來竟被研究工業管理 (industrial management) 者，挪用成爲「有效」進行管理的工具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亦即，如何在激勵勞工共同參與下，研究並形成一種讓生產更有效率，勞資更和諧的管理方式，而非根本本地反省與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生產關係³。雖然不少研究者強調行動研究的實踐取向 (例如夏林清 1993)，然而，對「參與」的強調容易模糊了「行動」概念中社會變革的面向，筆者因此改採「實踐」，以強調研究與根本社會改造的辯證關係。「實踐」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概念：「指有目的的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其目的在於改造物質世界和社會，也包括改造人類本身。『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普遍概念，引導人們注意經濟與社會制度的社會構成性質，並且讓人們看到改造這些制度的可能性，即人們獲得自由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個人層次上是無法完全實現的。」(Jary and Jary 1998) 因此，「實

3. 一般認爲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一詞始於因納粹而由德國逃往美國的社會心理學家 Kurt Lewin。他關切社會變遷歷程，用實驗及研究介入的方法，探究促進變遷的途徑及心理機制的轉化。Lewin 的變遷概念深刻影響行動研究以及組織發展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被運用在戰後歐美「產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計畫中，並轉化成爲知名工業，如 Volvo, Saab-Scania，研發激勵勞工參與、增加工作動機，以增加生產效率的理論和方法基礎。

踐式研究」不僅僅是讓被研究者參與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研究必須能指向物質世界，分析出社會的根本矛盾，並指出改變的可能。

這樣的研究方法，根本地否定了傳統社會科學的認識論。Peter Park (1989) 指出，傳統社會科學物化的結果，上綱了現實的不變性，消滅了社會史觀，他認為，看不到變動，就無法想見改變的可能。而如 Lather (1986) 所言，人類科學已由實證主義時期向後實證主義時期發展，企圖尋找一種「解放的社會科學」，以協助我們不僅是了解社會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更協助人們為了創造更公平的世界而去改變那不公平的分配（引自夏林清 1993）。本論文不僅承認研究不可避免具有影響力，更進一步視研究本身為一種「社會學干預」(sociological intervention) (Touraine 1981)，以培力被消音的受研究者。總之，新的研究課題指向社會關係與社會行動的範疇，不再僅僅研究一種情勢、趨勢或意見。

社會學的主要問題就是浮現這些關係，因而不再盲信於社會習俗的類別。這就為社會學者的積極干預奠定了基礎。他的任務就是要從一大堆被允許與被組織的習俗中揪出社會關係的真相 (Touraine 1981:139)。

干預並不僅是為了研究的緣故，只著重於研究本身及其自身的作用，正確地說，是在一場鬥爭和這鬥爭所代表的運動之中進行干預(同上：148)。Touraine (同上：142-144) 為社會學干預奠下四個原則。首先且最重要的原則是，社會學者必須直接面對社會運動。社會學家必須視自身為歷史行動者，以及做為比自身更重要的真實或具潛力的行動者的代言人。第二，社會學者必須超越意識形態的語言，站在社會運動團體的戰鬥位置上對其進行理解。第三，研究者不該被等同為行動者，且更不該被認定為站在行動者的敵對面。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應該就是將社會運動還原至其脈絡的人，扮演這種角色的人同時針對戰鬥者及其敵對面發言，並且，最重要者，勇於自鬥爭中釐清楚社會運動，因此，也勇於指出牽涉於衝突中的社會與文化的利弊得失。第四，

研究者所作的分析被轉化為戰鬥行動，研究者在參與社會運動團體的分析工作的過程中熟識運動。研究者不該被等同為行動者的這項要求並不妨礙研究者參與運動；與運動維持一種獨立的角色與一種客觀的距離即是服務於運動，這兩者對於將一項社會運動自最激烈的抗議鬥爭或叛變分離出來，均不可或缺。總結前述，Touraine 的社會學干預將研究者置於「一種直接突顯社會學課題、社會關係及集體行動的情勢中」（Touraine 1981:145）。因此，社會學干預即是「一種社會學的行動，其本身正是行動的社會學（the action of a sociology which is itself a sociology of action）」（同上：145）。

相對於 Touraine，巴西革命教育家與哲學家 Paulo Freire (1970) 的思想暗示，研究者介入第三世界所要求的遠比 Touraine 所想到的還多。首先，Touraine 所指的進行干預的社會學者，在 Freire 而言則是位解放教育者，其目的不僅是使文盲會讀會寫，更應助其批判性地認知他們個人與社會的現實，及根本地改造世界（Chung 1996）。根據 Freire 的想法，受壓迫者的教育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其性質既是人道主義又主張解放，首先面臨意識的問題。

教育法的第一階段必須處理受壓迫者的意識與壓迫者的意識問題，必須處理對人壓迫的男女與受害男女的問題，必須考慮他們的行為、他們的世界觀與倫理觀。一個特殊的問題是受壓迫者的雙重性（duality）：他們是相互矛盾、分裂的存在，生存於一個壓迫與暴力的具體情勢中並受其形塑（Freire 1970:37）。

通過解放教育，受壓迫者受培力以發展出一種面對壓迫世界的批判意識，並且，通過實踐，獻身於改造世界。改造壓迫的現實之後，這種教育法把對象從個人延伸至社會，「在持恆的解放過程中成為全體人民的教育法。」（同上：36）

Touraine 和 Freire 雖在傳統的學術專業劃分中分屬社會學和教育學，但在更一更基進的意義上，二者是站在同一基礎上的。就一基進的社會學者而言，除了對現實能提出批判性分析外，並能指出運動

的方向，以改變人的意識與行動，因此 Touraine 的社會學介入既含社會學的分析，亦有教育學的變革意圖。同樣地，對一基進的教育學者而言，為避免成爲統治者的社會化工具，必須對結構問題乃至於結構對人的意識的宰制有批判的分析，從而提出解放教育的方向與方法，因而 Freire 的受壓迫者教育者既是教育者，亦是批判的社會學家。

此外，Freire 與 Touraine 皆主張教育者／社會學者進行自我批判，但他們爲其設定的功能有所不同。對 Touraine 而言，自我批判是爲克服社會學者立場的脆弱，底線是對認同維持一種距離。對 Freire 而言則是爲深刻的再社會化 (re-socialization) 及與受壓迫者站同一戰線作準備，Freire 相信只有透過「重生」(rebirth)，與受壓迫者成爲同志，教育者才能了解受壓迫者行爲與生活的特徵，從而檢視這些行爲與特徵所反映的宰制結構，並進而爲／與 (for and with) 受壓迫者重新建構社會意識與現實 (1970:43)。

Freire 和 Touraine 的差異，和他們所處的社會情境有關。相較於來自第一世界的 Touraine，Freire 所面對的是明顯而激化的階級矛盾，農民除生活艱難外，連基本的受教權都未受保障，在此條件下，所謂的「客觀的距離」，無寧是向統治階級繳械。而 Touraine 發展「社會學干預」概念的具體運動經驗則是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生運動，作爲教授的 Touraine，是以知識份子的身份投身知識份子的運動，「客觀的距離」使得他能取得與運動主體——對教授無法完全信任的學生——之間較好的相對運動位置。相對的，Freire 面對的是無法掌握知識及訊息的基層群眾，他企圖透過識字教育進行群眾組織工作，Touraine 所奉爲規臬的「客觀的距離」反將造成群眾的不信任。同樣作爲進步的知識份子，Touraine 和 Freire 在投身社會運動遭遇一樣的過程：既要對問題有分析的高度，又須貼近群眾的真實；然而，兩者因所面對的運動條件不同，Touraine 在面對同是知識份子的學生運動群眾，他強調的是疏離，以避免陷入認同泥淖而失去分析視野，Freire 在面對與自己背景相差甚巨的農民，則強調向來居優勢的知識份子必

須再社會化，以更深刻掌握問題現實。

同為實踐式研究者，Freire 與 Touraine 的差異，提醒了我們，實踐式研究中的研究者與研究主體間的關係，或進一步而言，運動中的知識份子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必須端看社會情境，以及群眾的社會性質，來檢視拿捏的分寸。以下，本文企圖以本人所參與的「外籍新娘識字班」來討論，在台灣的社會情境中，以「外籍新娘」為主要組織群眾的實踐式研究，其中所涉及的議題。

受壓迫者教育法與識字班

「外籍新娘識字班」創設的目的，以認識中文為媒介，促使「外籍新娘」逐漸能自主發聲，並進而形成組織，為自身爭取權益；亦即，讓「外籍新娘」能走出孤立的處境，並進而形成自主的行動者以及集體。因此，識字教育並非企圖增加「外籍新娘」的適應力，而同化於台灣社會。這種對識字教育的認知，與 Paulo Freire 的教育觀相同——教育做為一種對自身及所處環境形成一批判的認識觀及改變世界的動力。Freire (1985) 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教育做為知識、技能及社會關係的再生產機制，已成為維持現有體制順利運轉的必要條件。因而，教育不再是提供批判性思考及改造行動的工具，而淪為替既有政治經濟體制服務的器具。

為了要產生具有社會變革意義的教育方式，Freire 提出結合「批判的語言」(language of critique) 以及「願景的語言」(language of possibility) 的解放教育觀 (Giroux 1985)。前者承襲批判社會學的傳統，指出教育作為既有政治、經濟及文化再生產機制的事實。然而，Freire 認為，如僅止於批判，將形成看不見希望的犬儒，因而他進一步提出「願景的語言」，強調希望及改造的集體行動的重要。簡而言之，Freire 的解放教育哲學，乃結合希望、批判性反省，以及集體行動。七〇年代他在巴西及智利，推動農民掃盲運動，目的在透過成人識字教育，一方面讓農民認清自身及結構性的問題，另一方面形成有機的

集體，共同改造命運。Freire 的解放教育顛覆了將「文盲」視為社會疾病，需要有識者救治的觀點，拒絕將文字變成傳輸「適應的意識型態」(ideology of accommodation) 以及強化「沈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 的工具 (Freire 1985: 9)。這股解放教育的風潮，從拉丁美洲燃燒至亞洲，甚至歐美，成為各地社會改革的重要推手。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外籍新娘」識字班於高雄美濃開課，為使社會大眾注意「外籍新娘」的議題，我們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式，邀請了幾位地方知名人士，包括國大代表（同時為縣長夫人）、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總幹事，國小校長以及當地里長。這個識字班在台灣為首創，專門為「外籍新娘」設計的課程，因而吸引了許多媒體的注意。在開幕式中，受邀人士的致詞傳達了人道主義的訊息：地方人有責任幫助「外籍新娘」融入台灣社會。

最初的課程由筆者設計，主要是介紹美濃的環境，並講解在夜市、郵局、銀行及機場等場合會碰上和用上的一些中文會話。然而，由於必須返回美國繼續學校的課程，遂請兩位美濃的朋友繼續識字班的課程。由於學習「標準」中文並非識字班的終極目的，因此特意不邀請專業的老師任教。我鼓勵春英姐來教；她是一位曾受苦於婚姻問題、求援於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家庭主婦。我希望能藉此幫助她建立自信，同時相信「外籍新娘」們面對這樣一位像媽媽的老師會感到比較自在。前一個願望達到了，在一份社區雜誌的特刊上，春英姐針對「外籍新娘」議題寫了一篇文章，她寫道：

有一天，曉鵬突然打電話給我，談到她已著手籌辦「外籍新娘識字班」的構想，我向地道賀，她卻邀我承接教導之責，在受寵若驚之下，不敢冒然的接受。除了完全沒有經驗外，回想從小到大求學過程中，一直都是角落裡的一員，不但少有當眾發言的機會，自己在座位裡也暗暗的祈禱老師不要叫到我，萬一叫到，早已緊張得臉紅心跳、結結巴巴而不知所云。在社會上也從沒有獨當一面的機會。曉鵬倒是很有耐心和誠意，不斷的給予說服和施打強

心針，令我願意試試，就這樣接了下來。（月光山雜誌 85 年，4 月 29 日，第 3 版）

受壓迫者劇場於「外籍新娘」識字班的應用

由於我無法親自實現原初的構想，春英姐和另一位識字班老師對識字班的運作感到困窘，只能以她們來自幼年受教經驗來進行教學，例如，從注音符號開始，並強調發音及筆順，甚至糾正寫字的姿勢。美濃愛鄉協進會幹部向一位熱心社區工作的小學校長求援，校長建議改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編的成人識字課程。然而，該教材仍為傳統識字教育觀的產物，僅關注「認字」，而不在意「意識」，其內容更與「外籍新娘」的生活情境大相逕庭。因此，識字班培養「外籍新娘」說、寫中文以外的自立能力的初衷並沒有付諸實行。

自「識字班」創辦後我開始研讀 Freire 解放教育法，並因而接觸了第三世界所發展出的各種解放教育形式，其中「受壓迫者劇場」最吸引我的注意力。

什麼是受壓迫者劇場？在歐美實踐 Augusto Boal「受壓迫者劇場」方法的 Adrian Jackson 下了最佳總結：

所謂受壓迫者劇場是表演（行動）重於言講，提問題重於給答案，分析重於接受（Boal 1992 p.xxiv）。

Boal 作為巴西社會運動家與藝術家，乃受 Paulo Freire 影響，基本上，Boal 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表演，而戲劇演出不應是專業者獨享的領域。他宣稱：

劇場是自我檢視的藝術……（所有）人類都是演員（actors）（他們表演！）與觀眾（spectors）（他們觀察！）。他們是觀—演者（Spect-Actors）（同上 p.xxx）。

並且，對 Boal 而言，「act」這個字具有雙重意涵：「表演」及「採取行動」。就 Boal 的認知，劇場正是改造的動力，非僅是資產階級的娛樂。

劇場……應該幫助我們習知我們自己與我們的時代。我們應該了解我們生存的世界，進而改變它。劇場是一種知識的形式；它應該，而且能夠，成為改造社會的一種手段。劇場可以幫助我們建造，而非僅是等待，我們的未來（同上 p.xxx）。

如同 Adrian Jackson 所適切形容的，

……如果，在這個受壓迫者劇場……Boal 把亞里斯多德的淨化論（catharsis）詮釋為社會針對它所屬成員的非社會（asocial）傾向所進行的一種洗滌，那麼 Boal 在本書中的重新定義就暗示個人，及廣義的社會本身，能藉由淨化而得到改造，淨化因此就不是統治集團的專屬領域了；淨化是一種可以指向任一方的武器。Boal 的淨化論乃是去除障礙，而非去除欲念；欲念被闡明而後得到強化，而非被馴化。在 Boal 這裏，通過淨化，被社會建制所監禁的欲念得到釋放。個人可能神經錯亂—或許整個社會，甚至國家，可能神經錯亂—或許這兩種現象間存在著某種關連……（Jackson 1995 譯者序）

一九九六年九月回到台灣之後，我與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幹部討論重新啟動「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可能性，我建議與努力使「受壓迫者劇場」地方化的鍾喬合作，希望透過民眾戲劇活潑的方式能激發「外籍新娘」的主動參與。是年十一月，結合「受壓迫者劇場」（Boal 1979）方法的新識字班課程開課，這一期課程中，我的角色主要是觀察和記錄；一方面在課堂裡擔任助教，有時「外籍新娘」不理解鍾喬意思時，從旁翻譯和進一步解說，另一方面於課後詢問「外籍新娘」上課的感想，並將觀察心得以及「外籍新娘」的回饋與鍾喬分享，作為下一次課程設計的基礎。

鍾喬第一次見識到「受壓迫者劇場」是經由「第三世界」（尤其是菲律賓）的「民眾劇場」（People's Theater）工作者，此後他一直試圖通過劇場，為徘徊於「第三世界」與「已開發國家」的台灣人，找出一種 Boal 式淨化的可能。知識份子為鍾喬過去比較習慣的工作對

象（筆者學生時代也曾參與並深受民眾劇場方法的吸引），為「外籍新娘」設計具有「民眾劇場」想法的識字班課程，對他而言頗具挑戰性，而我則希望藉由「民眾劇場」的活潑方式能帶動識字班原本呆板制式的氣氛，以達到打破「沈默文化」並進而促進「意識覺醒」的目的。由於識字班第四期結合「受壓迫者劇場」的識字班課程，是奠定日後較有系統課程的基礎，以下將就這十次工作坊的理念及成果進行討論。

前面說過，教「外籍新娘」讀、寫中文，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過識字作為媒介，她們得能自己發聲。如同民眾劇場的任工作坊，我們需要寬闊的房間，使參與者能自在地伸展肢體，因此我們把識字班從一般的教室移到沒有課桌椅的原木地板教室。在第一堂課，鍾喬向「外籍新娘」首先說明如何經由劇場與遊戲，將桎梏的身體釋放出來，並進而釋放同樣被桎梏的心靈，以發展出表達自我、建立集體互信的能力。接著進行肢體活動，例如，躺在地板上想像自己是樹葉，隨著節奏長大、縮小。另外也進行遊戲，讓參與者觸及「意識」的問題；例如，兩人一組，一位矇上眼睛，由另一位牽引，之後互換角色，遊戲後討論恐懼及信任等問題。這些開發肢體和觸及意識的遊戲雖然能成功地應用於大學生身上，「外籍新娘」却難以接受，縱使她們也覺得好玩，她們私下跟我說，小孩子才玩這種遊戲，為了學中文，她們請家人帶孩子；她們不是來玩的！

我問她們在這種工作坊是不是比在一般的課堂上更快樂，她們說是，但仍然認定學中文單字才是正事。有些人甚至建議我們舉行測驗，她們有壓力才會更用功；學習較快的「外籍新娘」再三向我們表示，必須用考試，才能讓其他學習不好的人更認真，她們學不好是因為不夠努力。我們悲傷地理解到，原來學習已變成一件殘酷的事情，特別是對被邊緣者而言。對她們來說，識字班的用意不是習知自我、發展創造力，而是用來熟習技能、提昇競爭力。這樣的現象，與拉丁美洲受壓迫的農民的「雙重性」(duality) 一致，Freire (1970) 指出受壓迫者同時具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性質。也就是說，「外籍新娘」內化

了壓迫者意識(oppessor consciousness)，用此成爲觀看自身以及其他受壓迫者的視角。然而，我們雖認爲「外籍新娘」的自我認知呈現了受壓迫者的雙重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自我反省到不能將「外籍新娘」的務實簡化，因而拉開和她們的距離，我和鍾喬做了討論，決定運用較被接受的方法，以逐步激發她們不同的自我觀看視角。

在第二次上課的前夜，我打電話每一位「外籍新娘」，告訴她們往後的上課重點將會是中文會話，因爲在過去她們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學寫字，罕有機會練習講中文。所以我們又移回到一般有課桌椅的教室，這樣讓她們覺得比較自在，因爲在她們的觀念裏教室就該是這種樣子。鍾喬說：「反正我也會中文，也一樣可以教識字。」

鍾喬設計了幾種不同的方法，讓「外籍新娘」覺得她們是在學習有用的東西，亦即書寫及會話用中文，同時她們又有表達自己的機會。在開始的時候鍾喬仍然使用比較抽象的方法，例如準備三張圖片：蝴蝶、面具與星球，然後問她們從圖片想到什麼，並請她們形容。鍾喬希望這些圖象會起鼓勵作用，使她們能更自在地表達感受，因爲感受的東西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然而可能是因爲這些圖象離日常生活太遙遠，而她們又不確定老師的用意，因而並沒有顯出熱心，沒有人願意主動提出自己的答案。好不容易有個人在半推半就狀況下說出答案後，其他人的答案往往是：「跟她的一樣。」

鍾喬逐漸試出讓「外籍新娘」能更直接連繫於生活經驗的方法。例如有一個活動叫做「我的一天」，請「外籍新娘」說出她們在一天的早上七點、十點、中午、下午兩點、四點及晚上八點等各個時段，分別聽到、看到、聞到和做什麼。在活動開始前，鍾喬要每一個人閉上眼睛，回想她們每天做的事，之後再請每個人回答，我們再把她們所說的話寫成中文，成爲當天識字的內容。她們反應熱烈，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世花⁴的一天是：

4. 所有引用的「外籍新娘」人名均爲假名。

早上七點鐘，從床上醒來，我聽到小孩的叫聲；
十點鐘的時候，我從窗戶看到鄰居在做鐵工；
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在廚房聞到炒菜的味道；
下午二點鐘，我聽到狗叫也看到很多狗；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在做水泥工；
晚上八點鐘，我又在教小孩心算。

美珠的一天是：

早上七點鐘，從床上醒來，我聽到小孩哭；
十點鐘的時候，我從房間看到我爸爸從田裡回來；
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在廚房聞到炒菜的味道；
下午二點鐘，我聽到爸爸起床的聲音也看到他去工作；
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在洗澡；
晚上八點鐘，我又在看電視。

Freire 的解放教育觀點強調識字與發展間的密切關聯：「**人民必須學會閱讀他們的現實，以及書寫他們自己的歷史。**」Freire 雖然認為宏觀的發展議題的討論，對於受壓迫者的意識覺醒非常重要，但他同時強調這些議題的呈現必須與受壓迫者個人的、在地問題緊密聯結，唯有如此識字才能激發批判意識，以及變革行動，因為，行動往往須有強烈的情感／情緒做動力。而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實踐識字教育的結果，亦發現識字教育必須以當事者的實際需求出發。

識字教育唯有在受教者……感受到須識字才能滿足他們最基本需求，特別是參與在他們所屬社群生活中決策的需求。因而，識字教育與參與無法分離，而參與同時是識字教育的目的與條件。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1976: 45)

在運用受壓迫者劇場的初期，我們仍難擺脫知識份子抽象思考的偏執，企圖用抽象的圖案引起「外籍新娘」的討論，結果完全如 Freire 所言，是失敗的。當我們開始從她們生活的點滴切入，進而進行文字、語言的學習，以及相關事務的分享，「外籍新娘」們明顯地打破過去的

沈默，積極地參與討論。這一期試驗性的工作坊課程之後，經過檢討重新編寫的教材內容則以「外籍新娘」的生活為藍本，使她們感受到親近性，並進而引發她們的興趣以及討論的熱忱。一位「外籍新娘」曾詢問識字班的志工老師春英姐，為何課文中的故事她都那麼熟悉，聽了春英姐解釋我們課文編寫的方法後，她恍然大悟：「難怪，我覺得課文就在說自己或是其他朋友，我還以為怎麼那麼巧！你們真是厲害，都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較諸於她們在工作坊之前的表現，她們笑得更多，更願意談話、提出問題和相互幫忙。在工作坊之前，她們只是重複老師說的東西。當老師嘗試讓她們單獨唸課文的時候，她們會羞怯，更不用說提問題了。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一起上課長達一年之後，她們竟然還叫不出同學的名字，或者不知道同學住在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更不用提集體感了。就這種情形，春英姐向我抱怨過很多次，而她則自責於無能在課堂上帶出一絲「我們大家」的感覺。做過幾次這種連繫於生活經驗的練習之後，她們總算對彼此及自己都比較了解了。

衝突與改造

然而，這種新的了解有時引發緊張。例如有一節課的主題是關於她們來台灣的經驗。鍾喬要每個人閉上眼睛，然後播放喜多郎的「絲路」，請她們回想離家、在飛機上，她們的感受是什麼，她們對台灣的想望以及對台灣的第一印象等等。音樂結束後，鍾喬請每個人分享經驗。春梅說：

我從新畸離開家時，聽到海鷗和船的聲音；

而後，我到坤甸的機場搭飛機，看到傷心的旅客；

我在飛機上想台灣會是很進步的地方，有高樓、機械化農業。

這種練習為「外籍新娘」提供了表達複雜的離鄉背井感受的環境，她們因而有機會知道其他人的相同感受；她們全都公開地談論悲傷的心情。在課堂上春梅原本很安靜，因為她缺了幾堂課，中文程度落在

其他人之後。有趣的是，在工作坊上她是幾位最善於表達、最坦率的「外籍新娘」之一。她形容在她離家前夕，是如何地感到恐慌。她無意中聽到一位要嫁到台灣的印尼新娘告訴父母，不想去台灣；父母要她不要擔心，嫁到台灣後要好好做人。一想到在台灣的未來，春梅就感到害怕，她說：「我的心很亂。我不會說中文，又不知道老公和婆家好不好…當我聽到海鷗和汽船嗚嗚叫，我的心都揪在一起了。」鍾喬告訴春梅及全班同學：「你的經驗很像中國一個偉大的詩人，李白。……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詩人……。」他於是把李白的詩寫在黑板上，並教她們唸。

幾位「外籍新娘」的丈夫，一如以往，上課時坐在教室後面，等待妻子下課。一聽到妻子們在講述來台灣的悲傷心境，他們慌張不已。其中有兩位丈夫向我們抱怨：「你們是想讓她們想家跑回去嗎？」他們的抱怨一時間使我們進退兩難。我們既了解又同情台灣丈夫的不安全感（因為媒體總是報導「外籍新娘」來台騙婚逃跑而街坊鄰居也隨時「關切」他們的妻子是否仍在台灣），同時還擔心他們會阻止妻子們來上課，因為家人的支持是她們得以參與識字班的最關鍵因素。然而，我們並不願意幫助鞏固這種父權。我們的目標是鼓勵「外籍新娘」批判地反省她們的經驗。鍾喬、我及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幹部很嚴肅地討論這種困境，決定繼續這種上課方式，即使「外籍新娘」與她們的丈夫因此而產生衝突，我們認為這樣遠比壓制她們的感受與自我陳述來得好。但同時，我們也不願讓衝突激化，成為未來工作的阻礙，因此必須時而參雜些「較不具威脅性」的活動，例如：如何上醫院就診。另一方面，我們也與有反對意見的先生溝通，讓他們理解離鄉之情應該得到適度的舒發。幾經努力，沒有「外籍新娘」因先生反對而缺堂，她們的丈夫也繼續坐在教室後面「旁聽」，或者帶著孩子在校園裡散步，等待母親下課。畢竟，這些課程是免費的，同時他們也觀察出太太在課堂中學了很多實用的知識，並且也開心了許多。春梅的先生就表示：「她去上課以後認識中文，比較敢自己出去了，有朋友聊聊也

開心多了。」

在識字班努力之下，我們觀察到她們夫妻間的兩性關係的一些微妙變化。爲了使「外籍新娘」免除照顧孩子的負擔，專心上課，我們提供了托嬰的服務，但仍有許多丈夫爲了讓太太能上課，志願待在教室後頭看顧小孩；有些先生則帶孩子在外面散步，下課時再回來接妻子；還有些是留在家裡照顧小孩。阿雪曾得意地告訴我：「每次只要有上課他就會幫忙帶小孩，讓我好好上課。沒上課之前他都不會幫我帶孩子呢，好像孩子是我一個人的！」

十次工作坊之後，我們亦看到了「外籍新娘」自身的變化。比起沒來上課的「外籍新娘」，來上課的「外籍新娘」變得更坦率、更能自我肯定，且更有團體感。有一次，幾位在星期日（工作坊時間）有工作的「外籍新娘」聽了口碑之後要求加入工作坊，我們因而把上課時間從星期日早上調整至星期一晚上。像剛開始工作坊時那般，這些剛加入的「外籍新娘」一被叫到名字都顯得很羞怯，已逐漸習慣在工作坊表達自己的老學員，則親切地鼓勵新成員，並較爲積極發言。

參與識字班的「外籍新娘」勇於表現她們自主的意見，這可以由一個例子看出。有一節工作坊的主題是關於環境污染，她們拿到三張圖片：第一張，一棟房屋，旁邊有一條乾淨而美麗的河流；第二張，一棟房屋，旁邊有一條被工廠污染的河流；第三張，一個大問號。鍾喬向她們解釋：「假設妳住在第一張的房子裏一旁邊有一條乾淨而美麗的河流，然後工廠搬進來，河流被污染，像第二張圖片那樣。妳希望河流回到第一張圖片那樣，那妳該怎麼？」頭兩位「外籍新娘」說她們會邀鄰居一起去找警察，請政府解決。雪芬接著說她會自己一個人去。鍾喬好奇地問爲什麼她的想法跟前面兩位同學不同，她自信地答說：「爲什麼一定要一樣？每個人的想法不同。」在工作坊以前，「外籍新娘」從不提出問題，被問時，也沒有人願意主動回答；不得已被點名，她們的答案往往是：「跟其他人一樣。」相較過去人云亦云的情勢，差異至爲顯明，她們已勇於表達；更令人興奮的是，她們

甚至能對權威（老師）提出質疑。在傳統強調「秩序」的教育觀下，「外籍新娘」對老師的質疑極可能被視為威脅而必須被舒解，甚至鎮壓，但在解放教育的立場，這樣的質疑象徵了「沈默文化」的破解，以及我們的方法的有效性。於是，鍾喬鼓勵雪芬的質疑，向大家說：
「是的，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最後一堂課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帶了一些點心與大家分享。鍾喬問她們上了十次課學到了些什麼，她們都說能講更多中文了。雖然沒有人提到對於自己有什麼新的認識，我們很肯定地認為她們更有自信、更能發揮能力了。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志工教大家唱客家山歌，並將歌詞改為描述識字班成員上課的情景。教唱完後，突然間，來自印尼的「外籍新娘」們歡天喜地用印尼話交談，鍾喬、我及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幹部真是霧裏看花，不久後美珠向我們宣佈：「我們要唱一首印尼歌。」接著她們邊唱邊拍手。之後美珠向我們解釋歌詞大意：「這首歌是在講當與朋友在一起時，我們是如何地快樂。想知道什麼時候還可以聚在一起，如果再也看不到可愛的朋友，我們會很傷心。」接著，我們請她們教我們唱印尼歌，美珠志願當老師，另一位「外籍新娘」建議唱另一首印尼歌，接著響起一首印尼童謠的旋律。

這與第一次上工作坊的時候形成鮮明的對照；當時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幹部準備了一個蛋糕，慶祝識字班開課一周年，我問她們是否可以唱一首印尼歌慶祝，她們只是羞羞地笑著，留下工作人員在台前尷尬地杵著。

Freire (1985) 對傳統識字教育的批判，除了將不識字者視為「無能」外，更批判了教育者自命為「救世主」(Messiah)。Freire 指出這種對「文盲」的觀點是一扭曲——將不識字者視為與其他人全然不同的「他者」，而未認知到他們的真實經驗以及由經驗中汲取的各種知識。將不識字者視為被動和馴化的識字教育，對不識字者而言是異化的經驗，無法感知到他們是能對現實的變革有所貢獻的。因而，受教者如何從被動的接受、受惠者，轉化為主動的參與者，乃至於貢獻者，

是受壓迫者教育法所關注的核心。在上述的十次工作坊中，我們不斷地企圖用各種媒介讓「外籍新娘」表達意見，即在促成從被動轉為主動的轉化過程。她們在最後一次課程時主動提出教唱印尼民謠的要求，便是這種轉化的開端。

此外，識字班幾年的努力也使美濃地方上對待「外籍新娘」的態度也變了。不同於媒體上所塑造的「外來者」及「他者」形象，美濃的鄉親開始把她們看成是「我們」。有一天，一位同時是美濃愛鄉協進會會員與美濃扶輪社社員的朋友跟我聊天，我主動跟他談到「外籍新娘」的議題與識字班，並建議扶輪社也可想想如何參與，他提議過年的時候由扶輪社出面宴請「外籍新娘」和她們的家人，而扶輪社那邊他會接洽。由於美濃扶輪社多位核心會員亦是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會員，並始終積極投入反水庫及社區運動，因此會裡很快就通過宴請「外籍新娘」的提案。我提供扶輪社一份美濃「外籍新娘」的名單，由他們發出請帖，在請帖中他們以美濃的一份子自居，邀請地方上的新成員——「外籍新娘」來參加歡迎宴。此後，每年過年前後，美濃扶輪社都會主動邀請全鎮「外籍新娘」及其家人，與社員們共度尾牙或喝春酒。一九九八年的母親節，扶輪社舉辦用母語（客語）表達對母親感念之情的演講比賽，特別為「外籍新娘」們設立組別，讓她們向鎮民表述思念母親之情。一九九九年開始美濃獅子會因苦於找不到服務的方向，向美濃愛鄉協進會尋求建議，我們也建議他們考慮「外籍新娘」相關議題，因此該年獅子會也跟進，將「外籍新娘」相關的座談會與中秋節活動列為社團活動之重點。二〇〇一年美濃的交工樂隊的新作品中便有兩首歌是為「外籍新娘」而作，其中一首「日久他鄉是故鄉」更是由「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學員主唱。交工樂隊的成員亦是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支持者，幾次「外籍新娘」活動我們邀請交工成員，而交工的活動亦常邀請識字班的學員參與，例如慶功會上一定少不了南洋美食。交工的「菊花夜行軍」專集以農村青年為主題，因為長時間與「外籍新娘」的相處，很自然地便將農村青年赴南洋娶妻的現象

納入創作之中。交工樂隊於美濃一年一度的社區重要活動「黃蝶祭」中舉辦新作發表演唱會，當「外籍新娘」主唱唱完第一段落時，引起台下觀眾熱烈的掌聲。表演結束後，許多觀眾表示那首歌讓他們得到最多的感動和啟發。一位工會運動的領袖激動地表示：「看到外籍新娘的表演，讓我反省到工會一直以來對外籍勞工的不友善，我們真應該反省！」此外，除了愛鄉協進會的女性幹部外，我們更廣招志工老師，培訓美濃的社區媽媽參與識字班的工作，這群媽媽們在美濃亦參加不同的社團，透過參與她們更深刻認識「外籍新娘」，從而打破過去的刻板印象，以更多的同理心面對遠來的新移民，並主動透過她們個人的社會網絡尋求各種協助識字班的資源，並讓她們周遭的親友更關心當地的「外籍新娘」。

經過我們幾年來在結合「外籍新娘」與美濃社區的努力，社區逐漸接受「外籍新娘」為社區的一份子。一九九七年夏天，在一期識字班結業之前，我們舉辦了師生及家人一日遊的活動，行程中路過一伯公（客家人稱土地公廟），正值老人家午憩。老人見一群年輕人欲在伯公下休息，告誡我們客家人的禮儀：「必須和伯公請安。」隨後，老人好奇地問我們從何處來？協會工作人員解釋，有許多是從東南亞嫁來美濃的媳婦，老人立即表示要帶我們向伯公請安，他誠心地祝禱：「伯公，這些是從很遠的南洋嫁來我們這裡的女孩，她們離家很遠，請伯公特別保佑她們在這裡平安。」

除了社區逐漸將「外籍新娘」視為自家人外，「外籍新娘」間的互助體系也逐漸成形中。美華、阿如等老學員，會特別注意周遭是否有剛嫁來的「外籍新娘」，並會積極詢問她們的狀況，及邀請她們參加識字班的課程及活動。學員間如有家庭糾紛，她們由過去消極地請識字班老師代為處理，逐步轉變為主動提供協助。美華的朋友常遭先生嫌棄，美華聽了數次朋友的苦水後，便藉著一次機會，當面質疑朋友的

先生，要求他善待妻子⁵。

鍾喬協助下的十次工作坊結束後，我們繼續以工作坊的互動形式進行識字班，並且依據實驗的經驗，逐步設計出新的屬於適合美濃的「外籍新娘」的課程及教師手冊，在這實驗後的沈澱過程中，我負責帶動識字班的老師，討論、設計課程，實際參與教學，並與志工老師和研究助理共合編寫教材和教師手冊。經過實驗、沈澱後，一九九七年底，識字班的初級班教材與教法大致確定，教學活動便由志工老師負責，我不再參與實際教學，但仍參與各種討論，以及負責師資的培訓和進修。初級班課程後，我們進一步設計進階課程，最後教材分為初、中、高三級課本及教師手冊，內容以學員為中心，分成個人、家庭、社區及社會四個面向，每個面向由二至三課的主題組成（詳見表一）。學員藉由基本識字活動，同時認識自身最貼切的家庭及生活週遭之社區文化、工作，以及台灣社會的教育、經濟、政治的機關、制度，並與東南亞社會進行比較。每次課程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暖身，透過與當日課程主題相關的遊戲活動，一方面讓學員進入討論情境，另一方面也做為當日主題的引子。第二部份為識字活動，藉由與她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議題或身邊的故事來進行中文的學習。第三部份為主題討論，以分組和其他方式來進行該日主題討論。除了正式課程外，亦安排參訪活動，例如，在認識社區的課程中，安排參訪幾個美濃地區的重要景點、產業、重要機構等等；當討論到女性團體的重要性時，拜訪了高雄縣鳳山的都市原住民婦女成長協會，透過與都市原住民婦女的分享，激發「外籍新娘」自主結社的動力。識字班的老師亦常結伴拜訪「外籍新娘」的家庭，除更進一步瞭解她們的生活狀況外，也讓其家人認識識字班。

逐漸地，我們在美濃以外地區尋找合作的團體，推展「外籍新娘

5. 關於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對「外籍新娘」造成的改變，詳見吳美雲（釋自淳）碩士論文（2001）。

表 7-1：「外籍新娘識字班」教材編輯架構

類別	課別	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名稱	課程目標	名稱	課程目標	名稱	課程目標
個人	第一課	自我介紹	學員相互認識與熟悉	好久不見	瞭解學員假期的生活；同學相互熟悉	當我們同在一起	寫作 說話表達
	第二課	我的故鄉	瞭解彼此在故鄉的生活情況	大家同心作環保	環保的重要	我的身份證	認識台灣的行政機關：派出所、戶政機關
	第三課	我的一天	瞭解學員日常生活狀況	探病	介紹台灣的醫療機構、體制	上郵局	金融機構簡介
	第四課	我的新家	瞭解學員家庭組成狀況	我的小孩上學了	台灣的教育制度；學習的重要性	來看看我們的姐妹	認識高雄地區的婦女組織
	第五課	有空來我家	相互介紹自己的家，以促進彼此聯絡。	我的另一半	瞭解學員婚姻狀況；家庭成員的角色及相處的方式	我們家的寶貝	家庭關係的討論
期中評鑑	第六課	教學評鑑					

類別	初級班		中級班		高級班	
	名稱	課程目標	名稱	課程目標	名稱	課程目標
社區／產業／工作	美濃山下	藉歌曲交流、客語及母語	我的工作	瞭解學員生活的經濟來源；討論工作條件。	應徵工作	討論在台應徵工作的困境及解決之道
	新的故鄉—美濃	美濃人文、經濟生活簡介	美濃的社團	認識社區團體	寶島台灣	了解台灣的發展史、社會經濟情況
	美麗的美濃	實地拜訪美濃名勝	誰是「外籍新娘」？	討論「外籍新娘」彼此的互動、面臨的困難、媒體形象	遠親近鄰東南亞	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
社會／組織／結社	親愛的朋友	學員進一步相互認識並交換生活心得	回國探親	母國的特產、文化特色	歡迎新同鄉	討論同鄉會、互助會的重要性及可行性
	我有話要說	書寫問候信、卡片	中秋節快樂	認識台灣的節慶；比較台灣與母國的節慶	姐妹們來坐坐	討論合作創業的可能性。
期末成果展	<p>我們這一班： 結業／教學評鑑／成果展／結業座談會</p>					

識字班」。最先接觸的是高雄鳳山的紫竹林精舍，由於我的研究生釋自淳法師的關係，促成了精舍及同屬香光比丘尼僧團的嘉義安惠佛學院在當地辦「外籍新娘識字班」。一九九九年內政部戶政司受立法院質詢壓力，邀集國內各相關單位召開「規劃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事宜」會議，會中決議以美濃之「外籍新娘識字班」為基礎，試辦一期「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做為往後全面於台灣各地推廣之依據。一九九九年十月完成試辦班後，內政部戶政司行文各縣市，鼓勵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由於擔心輔導班徒具形式，並成為同化「外籍新娘」的工具，筆者與識字班的老師們透過公開會議、私下溝通以及媒體投書(夏曉鵬等 2000)，要求戶政司辦理師資培訓。戶政司於二〇〇〇年開始每年辦理種子師資培訓，至今已辦理三期，內容由原美濃識字班工作班底結合其他資源共同設計。

幾年實踐已有初步結果，參與識字班的「外籍新娘」有了三方面具體轉變：(一)技能方面，逐漸具備或提升中文聽、說、讀、寫能力，脫離處處倚賴他人協助之窘境；(二)心理方面，產生自信，對外在之不安也逐漸消失；(三)社會方面，拓展人際關係和生活圈，也增進與家人的溝通話題。此外，志工教師們參與課程設計與教學後，不但打破過去對「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而且產生自信與開拓視野；並逐漸意識到切身相關的女性議題，進能主動組織志工(詳見吳美雲 2001)。

「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啓示

社會調查與實踐的辯證

美濃的「外籍新娘識字班」創立不久，一位女性主義學者發表文章批判識字班為「外籍新娘」提供較好的教育並協助適應環境，實是鼓勵更多男性去娶「外籍新娘」，因而強化了父權結構。一九九五和一九九六年，我曾接觸幾個主要台灣婦女團體，希望能針對「外籍新娘」福利舉行公聽會。其中一位領導人告訴我，她的團體討論的共識是，

要設法將「外籍新娘」送回母國，理由為，「外籍新娘」的婚姻純粹是買賣婚姻，是父權結構下將女性商品化的結果。筆者雖然同意「外籍新娘」被商品化的論點，却絕無法同意將她們送回母國是符合「外籍新娘」的最大利益，因為我深刻明瞭，她們和家人是如何地奮力地企圖掙脫窮困。此外，將識字班視為鼓勵男性娶「外籍新娘」的誘因，實是不瞭解這種跨國婚姻現象與不平等發展的關係（詳見夏曉鵬 2000），僅簡單地把台灣男性視為加害者。

上述兩個例子，說明了社會調查與實踐的重要關係。著文批判的女性主義學者和我接觸的婦女團體，都非常關注婦女的權益，但是這樣的視角，如果沒有實際調查為依據，往往導致立即反應式的行動。誠如 Hope 和 Timmel (1984) 所言，

沒有行動的沈思不過是空言泛語⁶，

沒有深思的行動則是純行動主義。

「外籍新娘識字班」是因為實際調查而得知「外籍新娘」的需求而創設，同時由更入探究而理解到，「外籍新娘」現象不僅是性別的問題，更交雜了國內和國際政治經驗發展的面向；亦即，我們認識到問題的主要矛盾在於不平等發展的結構及其代理人，而非婚姻中的男性。因此，我和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的伙伴，並未把「台灣新郎」當作罪首，反而希望能藉著與他們的良好互動，取得信任，好讓他們的妻子能更自在的參與識字班，並擴展與外界的互動。而「外籍新娘」的自主能力及社會網絡的形成，則更能改變她們原本和先生的依附關係，進而改變先生的性別態度。在這樣的考量下，當我們在識字班進行意識覺醒的活動而造成先生們的不安時（如前面提到的「絲路」的例子），我們小心地處理，讓他們略為心安，讓識字班繼續進行。

實踐一方面須有社會調查作為行動的指導方針，另一方面亦提供

6. Freire (1970:68) 認為實踐是行動和反省一體。「空言泛語」(verbalism) 是「犧牲行動」(sacrifice of action)，而「行動主義」(activism) 則是「犧牲反省」(sacrifice of reflection)。

自吳美雲 2001)：

傳統研究方法的運用

實踐式研究不是一種研究方法或技術，而是一種方法論，涉及研究者的價值與世界觀。如夏林清（1993:6）所指出，相對於傳統實證主義的研究，「實踐取向的研究者企圖通過研究過程……增加人們：(1)對生活中隱含矛盾經驗的覺察。(2)認識社會既定的現況是怎樣在維持著它的運作機制而不易改變的。以及(3)去發現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在當下的社會過程，轉化發生的『可能性』，和『如何發生』的一個社會轉化過程。」因而，以這樣的認識論為指導方針運用傳統的研究方法，亦能達到實踐的目的。以筆者從事多年的「外籍新娘」實踐式研究為例，在過程中運用了參與觀察、訪談、焦點團體法，甚至於實證研究慣用的問卷和統計資料，但這些方法的運用都共同指向實踐的目的。以下將簡要說明筆者如何融合傳統研究方法，以運用於實踐式研究。

在推動「外籍新娘識字班」之前，筆者已就「外籍新娘」現象做廣泛的調查，使用的方法包括二手資料（例如官方統計、調查報告、媒體報導等）、問卷統計（印尼及越南駐外單位於「外籍新娘」辦理簽證時所發的問卷）、參與觀察和訪談，經過調查分析後，瞭解到「外籍新娘」現象形成的結構因素，以及「外籍新娘」在台灣生活最立即的困境，才著手「識字班」的推動。推動過程中仍持續參與觀察「外籍新娘」和家人、親友的互動，並以簡單問卷方式進行識字班的評估，作為識字班修正或新的行動方案推動的基礎。

識字班上課的工作坊（workshop）形式，可視為焦點團體法的轉化。焦點團體法的作用在於「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研究者可以從此對話和互動取得資料和洞察……。」（胡幼慧 1996）工作坊的目的，則在取得資料和洞察之外，更加上意識覺醒（conscientization）、培力（empowerment）。在識字班的小團體裡，研究者／志工教師，以提問方法（problem-posing）

帶動團體討論議題，不僅是瞭解「外籍新娘」的生活處境，並共同尋找問題解決方法。除了識字班的工作坊外，筆者和志工教師亦經常結伴訪問「外籍新娘」的家庭，這種訪問可視為較非正式的焦點團體，一方面可瞭解她們的家庭生活，另一面增加志工教師與「外籍新娘」家庭的互動，以增進信任，並讓家人意識到「外籍新娘」已有社會網絡形成，並非孤立無援。

民衆劇場與解放教育結合的實踐式研究方法

「外籍新娘識字班」創立之時便以建立「外籍新娘」批判的意識及自我組織為宗旨，然而這樣的理念無法一蹴可及。如前所言，經過多般嘗試，才將識字班課程進行方式系統化為三大段落：暖身活動、文字學習、問題討論，這樣的方法實為結合民衆劇場與解放教育。

強調「意識覺醒」與「培力」的實踐式研究，必須有相應的有效方法，否則僅能流於抽象的理論與崇高的理想。許多人在閱讀 Paulo Freire 的解放教育理念後，深受啓蒙，但却不知如何將之付之實踐 (Hope and Timmel 1984)。Freire 的解放教育強調「對話」(dialogue) 的重要，反對傳統「填鴨式」(banking) 教法，而主張透過「提問」(problem-posing) 來引起批判性的自覺 (critical awareness)。然而，如何使「提問」不變成壓迫性的「拷問」，必須用有效的方法來打開對話的空間，而劇場方法便能有效地營造互動的氛圍。與 Freire 同時的巴西劇場工作者 Augusto Boal 所發展出的民衆劇場便將解放教育的理念以劇場形式呈現，透過「雕像」、「論壇劇場」等方法，把人民——「觀賞者」(spectator)，從劇場影像中的被動實體轉變為主體，轉變為戲劇行為的改革者。透過扮演，嘗試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討論各種改變策略，民衆劇場因而成為「革命的預演」(rehearsal for the revolution)。

解放教育與民衆劇場的融合，廣為第三世界基層組織運用。牙買加的「姐妹劇場」便成功地組織了牙買加蔗糖女工解決了自身問題 (例

如同工不同酬、社區飲水問題等等) (French 1987)。此外，一九七〇年代在非洲發展出的「社會轉化訓練 (Training for Transformation)」強調小組式的互動和通過創新的方式，例如遊戲、角色扮演、戲劇和討論來探索重要議題，從而開展了自我發現的過程 (Hope and Timmel 1984)。

Hope 和 Timmel (1984) 將 Freire 的理念發展成有系統的工作方法。藉由「通關密語 (code)」的使用，將小組聚焦於所欲探討之問題，並引發熱烈的討論。「通關密語」意謂著，藉由適當的媒介 (如「芝麻開門」般)，以激發出後續的討論及行動。媒介可以是圖片、短劇、或任何媒介，但必須具備七個條件：(1)處理社群感受最強烈的議題；(2)呈現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3)運用對比或行動以喚起意識或問題；(4)只聚焦在一個主題，使能深入討論問題；(5)簡單、清楚、易見；(6)避免干擾的細節，特別是主題外的人事物；(7)激起興趣，並觸及小組成員的心靈。討論分為六個步驟：(1)「通關密語」的描述——從中看到了什麼？；(2)初步分析——他們為什麼這麼做？；(3)現實生活——現實生活中也有類似的事嗎？；(4)相關問題——和哪些問題有關？(5)問題根源——如何分析？(6)行動計劃——怎麼辦？

很顯然地，這樣的「通關密語」需要經過細緻的社會調查，才能找到能產生後續思辯及行動的主題 (即 Freire 所謂的「generative theme」)。再者，由於意識的問題往往相當私密、隱諱，很難直接觸及，「通關密語」使參與者能退後一步，以較客觀的角度思考。Hope 和 Timmel 設計的討論方法，首先讓參與者討論戲劇或圖片中「那些人」的問題，之後才漸進地觸及到現實生活。以下以識字班某次課程為例說明。

在第五期識字班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少「外籍新娘」由於先生和其家人相當體貼、照顧，而漸漸產生依賴，相當沈浸在幸福感而不覺得能在台灣獨立生存的重要性，對於學習中文或者建立朋友網絡也不感熱衷。於是我們設計了一個「通關密語」希望能引起討論。我和識

字班的志工老師們向「外籍新娘」敘述了一個情境：先生和家人有事外出，你一個人在家帶孩子，半夜孩子發高燒，必須帶他去醫院急診。接著，一位志工老師身著制服扮演護士坐在掛號處（以簡單的桌椅和告示牌表示），我們請識字班學員輪流抱著洋娃娃，向護士掛急診，護士問了一些相關問題後拿出病歷表要求「外籍新娘」填寫。待每位學員「親歷」掛急診的情境後，我們進行討論。首先，我們問及當時的感受，她們都表示很惶恐。爲什麼呢？因爲她們看不懂表格，有些人表示不知家裡的地址，或者不知如何用中文向護士說明病情……。我們進而討論在現實生活是否有可能發生類似狀況，以及她們應如何面對？春梅建議要多和鄰居建立良好關係，有急事可請他們幫忙；阿雪認爲同學間應留下電話號碼，平時多聯絡；美華表示大家應更用心學中文，才能跟他人溝通，也才能自己填寫各種表格……。透過這次活動，學員們更加意識到自立以及互助的重要性。

實踐式研究對民主參與的要求

多數實踐式研究者強調研究對象的參與，例如，Lather (1986) 認爲研究過程應是一「探究的民主化過程」(a democratized process of inquiry)；Greenwood 和 Levin (1998) 認爲「行動研究將專業研究者和在地相關團體的關係民主化」；而 Argyris (1985) 更發展了一套「協同研究」的方法。誠如夏林清 (1993) 所指出，實踐取向研究中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並非「資料收集者」與「資料被收集者」；對研究對象而言，研究是一個經驗到被了解與學習的過程；而對研究者而言，研究則是時時自我反思 (self-reflexive) 的歷程。

然而，實踐式研究對「共同參與」的要求，若無指向社會矛盾、共同從事社會變革，作爲基本精神與目的，那麼將「研究對象」改變爲「協同研究者」徒具民主的形式，或者可被批評爲利用研究對象爲「廉價的研究助理」。

所謂「民主」不僅是參與的形式，更涉及結構平等的問題。實踐

式研究面對的對象往往是現存政治經濟結構中被壓迫的一群，而由於結構的擠壓，使得他們呈現「無能力」（例如不識字）的狀態。對於「能力」的問題，實踐式研究者批判主流社會價值將之「自然化」（亦即漠視政治經濟結構擠壓），或者「個人化」視為個人努力（或不努力）的成果。然而，實踐式研究同時必須避免「民粹主義」，將民眾現狀浪漫化。實踐式研究中的根本精神在於「培力」（empowerment），或譯為「賦權」，首先必須相信的是民眾有擁有能力的「潛力」（而非現況），從而協助他們培養批判檢視自身處境與結構的關係，以及集體變革現況的能力。在此意義之下，實踐式研究堅持研究對象「參與」的精神，其「協同研究」的形式與程度應依條件而不同。

以 Freire 所面對的拉丁美洲不識字的農民為例，Freire 並未將不識字的現實浪漫化，而是以他知識份子宏觀分析為依，面對不識字的結構成因，以及識字與批同意識間的關連，在相信民眾有變革社會的潛力的基礎上，進行識字教育。在此過程中，農民並非一開始便參與的「協同研究者」，因為識字計畫並非農民自發決定，亦即 Freire 並非透過民主的討論方式，由農民們自行決定他們需要識字課程；但在識字的內容以及教學的方法上，研究者／教育者有計畫地讓農民有參與感。

在面對受壓迫者時，他們往往會提出各種需求的訊息，期盼從象徵社會資源的研究者身上得到援助。面對這樣的需求，實踐式研究者不能僅以「我們一起來協同研究」回應，因為如此既無法建立民眾的信任，更是漠視自己身處較優勢的社會位置所應發揮的作用。在社會發展高度失衡導致嚴重不公不義，知識與資訊管道受控於菁英的「第三世界」中，社會運動通常在國家的壓制與剝削中爆發開來，在這情況中社會學干預更見其價值與重要性。社會學者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享有特權，不僅有機會接觸最全面與最有批判性的資訊與知識，其所處位置更有利於展開對既定秩序的鬥爭，社會學干預因之有助於延長並深化社會運動（Chung 1996）。亦即，知識份子往往必須透過其分

析，找到介入的切入點，而此切入點在開始時往往是群眾因其被邊緣的位置無法完全掌握的。

此外，實踐取向研究應深入討論「虛假意識」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與轉化的機轉。「我們要去發現：需要那些條件，人們才能較自由地對意識型態進行批判討論。……實踐取向研究著重互動與對話的研究設計，而此種設計得以進行，便是基於人們的自我了解是具有轉化的辯證性質的；此一辯證歷程的進展不只是帶來研究者的自我反映，而進一步的提供了一個討論的空間來發現及檢驗概念與理論性的架構。」

(Lather 1986, 引自夏林清 1993: 頁 7) 然而，對話 (dialogue) 不僅是談話 (conversation)，它必須被營造出來；特別是對受壓迫者而言，或許因長期被消音而習慣沈默，亦或因不信任而以沈默自保，一味強調民主參與並不能達成真正對話的目的，與受壓迫者間對話的營造便是培力的過程。「外籍新娘」在台灣的現實中，原沒有「對話」甚至「說話」的「能力」，一方面是她們原本的能力，在台灣突然變得無效 (成人教育所謂的「功能性文盲」)，她們無法表達；另一方面是 Freire 所指的「沈默的文化」，受壓迫者的「冷漠」(apathy) 和「宿命論」(fatalism)，必須先打破，所謂的「民主的參與」(真正的對話) 才有可能。因此，在「外籍新娘識字班」裡，我們便花了相當的時間及嘗試各種方法才能建立較良好的互動與對話，進而才能讓她們更進一步參與，例如一起做家庭訪問，以及識字課程的設計與檢討。

剛開始的參與是有限的，經過數年的互動和信任的培養，目前已漸進入「外籍新娘」為主體，識字班老師為輔助的階段，這個階段經過相當漫長的時間才達到。過去我們也不斷地在課程中與「外籍新娘」討論她們自主組織的可能，並帶她們參訪一個自主的都市原住民婦女社團，但她們都認為自己沒有能力，或者客觀條件不允許 (例如忙於照顧孩子、上班)。在二〇〇一年九月的希望工作坊，我們再度提起她們組織的可能，答案一樣令人沮喪。識字班老師們決定要以更嚴肅的方式與「外籍新娘」討論自主的問題，我們決定用「論壇劇場」的方

式，由識字班老師演出她們熱心邀請「外籍新娘」上課，而許多「外籍新娘」却因各種理由缺席的狀況。表演完後，我扮演「論壇劇場」中的「丑角」(joker)，訪問老師為何沮喪，以及「外籍新娘」的感受。在「外籍新娘」感知到老師們的辛苦和無耐後，我向大家說：「既然老師那麼累，同學們又不太積極，那麼我們就把識字班結束好了！」「外籍新娘」們立即熱烈反應：「不可以！我們不能結束！」從此，我進一步請大家討論該如何讓「識字班」持續，而她們可以如何更積極介入，最後才得出令人振奮的結論：要有一個自己的聚點，自己來管理和經營。這是一個成功的討論，因為它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形成。然而，這樣的討論如果沒有識字班老師和「外籍新娘」之間互信互賴的基礎，是無法達成的。也就是說，假使「外籍新娘」未深刻感受到老師們遠超過她們的付出，她們不會強烈表示不願讓識字班結束，也無法激發她們更自主投入的意志。目前「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已進入成立以這群新女性移民為主體之社團的籌備階段。

團體協力的必要性

實踐式研究在本質上必須是挑戰個人主義的，因為它所面對的是社會的結構性矛盾，是必須透過集體力量才能撼動的現實。因而，實踐必然是集體的，而實踐式研究也須靠團體協力才能持續。

「外籍新娘識字班」雖然進行多年，但至目前為止也僅能成功地達到打破「外籍新娘」的冷漠，讓她們較積極地參與，距離她們能批判地看清自身命運與結構的關連、成立自主性團體，為自身權益而戰，仍有相當漫長的路途。過程中遇到不少挫折、瓶頸，一人之力勢必無法承擔。而在個人因挫折而退却，或是因現實狀況無法持續時，團隊的其他成員便發揮了激勵和接替的作用。「外籍新娘識字班」一開始便藉由「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力量起動，從資源的整合、拓展（例如與當地學校、社團的關係），到執行的各個細節（例如場地的接洽、學員的聯繫、實際教學等），協進會的幹部和志工都提供了不同的協助。「外

籍新娘識字班」雖由我發起，但從開始便是靠許多人的協力來進行。從二〇〇〇年開始，更與協進會的幹部與其他友好團體策劃，較有系統地培養當地的志工，除了協助識字班的發展外，也成為組織當地婦女的新途徑⁷。識字班的教師們也開始發展新的教材，以及產生新的行動的構思。更具體而言，識字班如果不是一開始便透過團體協力方式，在我於一九九七年九月開始任教於台北之後，必會因時間、空間各方面客觀的阻礙而無法延續，更遑論多年後所發展出各種新的方法與方向。

另一個以集體進行實踐式研究的例子是夏林清教授。不論是關於女工、關廠工人，或者是公娼議題，夏林清教授的實踐式研究的重要支撐便是一群長期投入工人運動的幹部。實踐式研究者必須將自己視為團隊的一員，而非獨撐大局的個體。過程中必須不斷讓更多人投入，甚至，逐漸讓自己由起動的關鍵性角色淡出，激發更多人的能動性。如此，方能避免因個人動力的耗弱而中止，也才能持續進行以趨近社會變革的目標。因此，形成團隊和擴大參與，同時是實踐式研究的條件與目標。以目前「外籍新娘識字班」的階段而言，識字班的推動主要依靠的便是這群愛鄉協進會的幹部和志工，我個人的角色已由主要的推動／執行者，淡化為參與討論、向外擴展與其他團體的連結、甚至是從旁觀察、記錄，以提供建議。

此外，實踐式研究必須與更大的社會運動聯結，否則可能成為在令人不滿的社會中「洗滌」心靈的馴化性工具。「受壓迫者劇場」的創始者 Augusto Boal 討論了亞里斯多德到布萊希特之間，劇場理論在意識形態上的變革。布萊希特顛覆了亞里斯多德以來詩學／劇場的菁英階級傾向：藉由悲劇情境將觀眾震懾，產生了「洗滌」(catharsis)的作用——讓觀眾心存警惕地坐在觀眾席上，壓抑了對現實不平等、

7. 藉由投入識字班的工作，喚起女性志工的性別意識，並培養了她們的自信與集體意識。關於識字班對志工的賦權，請詳見釋自淳的碩士論文（吳美雲 2001）。

不正義的憤懣，也就是透過劇場將之「馴化」(domesticate)。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 (Epic Theater) 以疏離效應迫使觀眾面對舞台上所呈現的矛盾情境。從批判亞里斯多德的移情作用出發，Boal 推崇布萊希特史詩劇場的疏離效應，並進而讓觀眾在觀眾席走向舞台，成為主角，以身體表達自己。這是 Boal 式的「洗滌」——透過劇場，受壓迫者經歷了一場對現實的批判，並透過角色扮演，以身體參與了行動方案的策劃與演練，因而「受壓迫者劇場」被稱為「革命的預演」。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受壓迫者劇場」與社會運動組織結合，的確達到了「革命的預演」的目的（如牙買加的「姐妹劇場」和菲律賓尼格洛斯島的「蔗工劇場」）。然而，當「受壓迫者劇場」與社會運動脫離時，它却可能弔詭地成為另一種更細緻地「馴化」。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矛盾，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以及改變的慾望。此時，「受壓迫者劇場」所強調的觀眾投入演出，表達不滿及期待的意見和行動，成為觀眾舒解情緒的出口。如果沒有與更大的社會運動結合，「受壓迫者劇場」便成為心理諮商，不滿的情緒不僅得到消解，同時因為「身體力行」（角色扮演）而化解了自己不行動的焦慮。

同樣地，實踐式研究提供了對現實不滿且有改變現況慾望的研究者一個發揮的場域。然而，這樣的發揮如果未與更大的社會運動聯結，它將成為另一種馴化研究者的機制。以跨國婚姻的例子而言，菲律賓的婦女以「郵購新娘」形式嫁往第一世界行之已久，這樣的現象與菲律賓長久以來被殖民、受第一世界壓迫的歷史息息相關 (Aguilar 1987)。菲律賓的草根婦女聯盟 GABRIELA 便成功地將這個議題與菲律賓的人民運動，乃至於國際反帝、反資本國際化的運動聯結。在美、日、澳等菲籍「郵購新娘」眾多的地區，GABRIELA 組織了她們，一方面為自身權力求奮鬥，同時也與母國的社會運動聯結，更與國際反資本主義國際化運動串連。而與這樣既深且廣的運動結合的，是無數個實踐式研究的調查團隊。與 GABRIELA 協同的一個非營利組織 CWR (Center for Women's Resources) 便由一群有能力從事研究、

調查的工作人員及志工組成，她們除了提供婦女各項服務外，最重要的一項任務便是進行調查，作為 GABRIELA 組織及行動的基礎。同樣是跨國婚姻的議題，目前「外籍新娘識字班」尚未能與「外籍新娘」母國的運動團體連結，更未能對資本國際化發聲，未來需擴大聯結，亦即，強化團體協力的廣度與深度。

實踐式研究成就更好的社會研究

傳統客觀主義的研究，認為行動、參與，將使所得資料不夠客觀，因而破壞研究的完整。然而，透過對「外籍新娘」的實踐式研究，筆者更深信，實踐式研究非但不會破壞研究，反而成就更好的社會研究。

如前提及，筆者最常遭遇的學術問題是如何取得資料。希望透過詳細陳述「外籍新娘識字班」的過程，讀者能體會，資料的取得往往必須建立信任，而信任關係並非靠友善的態度便可完成，更深層的信任必須建立在共同經歷一個「重生」的過程，亦即，一個共同努力實踐改變現實的過程。因此，實踐式研究能提供更高品質——深入而非表象的資料。

此外，社會研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社會發展、變遷，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意識便是變遷的機制，而這正是實踐式研究的最終命題。行動研究的創始者 Kurt Lewin 的幾句名言，可做最佳註腳（引自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沒有什麼比好的理論更實際的」

（Nothing is as practical as a good theory.）「理解事物的最佳途徑就是試著去改變它」（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is to try to change it.）Lewin 重新定義研究者的角色，以及研究品質的評判標準。好的研究是能協助解決真實生活中問題的研究，而研究者的角色也從傳統的觀察者成為涉入具體問題的解決（出處同上）。

除行動研究外，實踐取向的另一支為批判民族誌（Lather 1986）。批判民族誌可以被理解為展現與解釋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其研究焦點有二：（一）社會結構性限制和行動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二）個體與

集體行動者在這個辯證關係中所具有的相對自主性 (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human agency)；這兩個研究焦點的最終目標是企圖將個體由鎮壓及專制的社會機制中解放出來 (夏林清 1993:10)。

實踐式研究之所以能成就更好的研究，便是因為社會結構的限制和其轉變的機制，如果沒有涉入實踐，將很難看其動態。以「外籍新娘識字班」的推動為例，一開始並不受到相關單位的重視，一九九九年內政部戶政司因立法院壓力而急欲辦理「外籍新娘生活輔導適應班」時，各縣市的民政單位皆表示「非業務範圍」而消極抵制；內政部戶政司幾次的協調會議中，教育單位亦表示「外籍新娘」並非「國民」不屬其服務對象，「外籍新娘」如欲學習，可以參加各地的補校。在戶政司官員強力推動下，部份縣市民政局開設輔導班。然而，戶政司雖有意推動，但仍不脫同化心態，對於師資、課程內容並無較開創性的想法。在透過私下與官員、承辦人折衝，並加上由外部製造壓力——投稿民意論壇，才促使內政部辦理種子師資培訓。第一期培訓時，一開始多數承辦人員及志工教師，皆表示百般無耐，只希望我們能提供現成的教材，讓他們交差。透過各種工作坊方式，我們讓參與培訓的人員產生「感同深受」⁸，以激發他們對「外籍新娘」服務工作的熱忱，進而鼓勵他們自創教材、活動。次年的種子培訓時，前一年的學員明顯展現不同的認知，多數在第一次培訓後積極從事教材、活動的設計，並善用既有的行政資源，以更順利地推動「外籍新娘」相關學習活動。這次培訓證明，即使是一般認為最僵化的行政官僚，透過適當的方法也能激發其能動性，從而舒緩結構的限制。

在此過程中，我們經驗了「結構」的限制（例如政府官員和承辦人員對「外籍新娘」的刻板印象），以及如何透過激發行動使限制舒緩。

8. 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式是筆者放一段沒有中文字幕的英文影片，之後毫無預警地以英文進行討論，迫使他們處在一個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中，之後再以中文請他們分享感受。幾乎毫無例外地，他們都深感壓迫，並進一步思考到「外籍新娘」在台灣的處境，以及本地人可以提供何種協助。

由於實踐，結構變得動態（是 structuring, 而非僵化的 structure），我們更能立體地檢視結構與行動的辯證。

此外，由於實踐而引來媒體的注意，筆者更進一步親歷知識生產的權力競逐。積極介入被邊緣化的受訪者，培養出她們的能力與自信，這樣的一種參與不僅為無聲者發聲，還能揭露統治菁英的控管方式（Feagin and Vera 2001）。如前提及，由於其首創性與基進關懷，「外籍新娘識字班」引發了媒體的高度興趣與好奇，與美濃愛鄉協進會及我聯繫的媒體工作者絡繹不絕。筆者另一篇文章詳述和媒體交涉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充份領會了媒體生產「事實」（reality）的機制。儘管我們以各種方式企圖以批判的觀點詮釋「外籍新娘」現象，但因為無法掌握媒體工具，報導出的內容往往將「外籍新娘」描述為怪異的「他者」。該文所討論的媒體報導，提供了檢視「主張形成」（claim-making）的政治性本質（夏曉鵬 2001）。而對這些知識生產過程的角力鬥爭的第一手經驗觀察，唯有透過親身參與，而非保持距離，才得以完成。

請來自我批判

實踐研究者強調介入以改變既有的壓迫性結構，因此對於消音機制有相當的批判，然而這樣的批判同樣地適用於實踐研究者。堅持為無聲者發聲（to voice the voiceless），「由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參與式研究，這樣的使命常會把實踐式研究者放置到一種脆弱的立場上。從識字班的經驗，我終能了解到，所謂的「表達自我」，很不幸地，業已變成知識份子與專家的一項特權。當被要求表達意見與感受，尤其是在一個團體之前，「外籍新娘」常會答說：「我不知道」或「我不知道怎麼說」，這些答案很容易被用來證明這些「尋常人等」真的是頭腦簡單或無能。然而，從解放社會學的觀點，我們要相信這種回應方式是「屈於劣勢者（underdog）」自我保護的一種常用策略（Miller 1993），因為他們心知肚明，他們的意見在主流社會而言是不

存在或不列入考慮的。雖然如此，主流社會却會自賦特權，將其意見強置於無聲者頭上；一個能自我反省的研究者會很快地警覺到這種危險性，提防自己也成為強勢貫徹自我意志的人。這種理解當然也很容易導致一種不採取行動 (inactivity) 的決定，而這又是一種新保守主義 (neo-conservatism) 了，因為不採取任何行動就是為現狀服務。Touraine (1981:203) 警告我們，

事實上研究者必須對抗他自身中的宰制性部份。因此，他必須被攤在社會運動團體的批判之下；他必須超越我執，而後得能從運動的觀點出發，進行發言。

由我與媒體工作者交涉的經驗可以說明，一位實踐式研究者的立場是如何地脆弱。媒體透過剪接等產製過程，操縱「受壓迫者」的聲音和形象，當「外籍新娘」向我抱怨媒體的粗暴而希望我代為交涉時，面對我的批判，媒體主管反過來指責我不是「受壓迫者」的衣食父母，因此無權替他們講話（詳見夏曉鵬 2001）。實踐研究者必須堅持站在「受壓迫者」的立場，然而，同時又時時必須質疑自我的角色，以及擔心越俎代庖地自命為受壓迫者的代言人。

由於對社會變革的強調，以及對反身自省的要求，實踐研究者常常必須面對他人和自我的質疑，這是其批判傳統客觀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所必然帶來的結果，無法用一套客觀的理論和方法解決；因為它最終涉及了研究者自身對生命價值的抉擇；至於實踐本身的是非論斷，唯有留交眾人和歷史判斷，這是個無可逃避的風險。這幾年的透過「外籍新娘識字班」的實踐經驗讓我反省到，當今學者的困境不在於風險太多，而在於我們都太害怕風險，因此以各種學術的包裝掩飾我們的焦慮。這樣的焦慮曾讓我裹足不前，從而懷疑自己留在學術領域的意義。但這幾年投入實踐式研究的親身體驗，讓我憶起初次遇見社會學，被她批判性格深深吸引而產生的感動。實踐，讓我重新肯定學術的價值！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月光山雜誌，民 85 年，4 月 29 日，第 3 版

吳美雲（釋自淳），2001，《識字作為一個「賦權」運動：以「外籍新娘生活適應班」為例探討》，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幼慧，1996，〈焦點團體法〉，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頁 223-237。

夏林清，1993，《由實務取向到社會實踐：有關台灣勞工生活的調查報告（1987-1992）》。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1996，〈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收錄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頁 99-120。

夏曉鵬，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9 期，頁 45-92。

夏曉鵬，2001，〈「外籍新娘」現象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即將出版。

夏曉鵬、宋長青、釋自淳，2000，〈外籍新娘識字班官方版流於形式〉，《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民 89 年 6 月 16 日。

Jary, David and Julia Jary 著，周業謙、周光淦譯，1998，《社會學辭典》（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Sociology），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英文部分：

Aguilar, Delia M., 1987, "Wome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ilippines." *Alternatives*, 12: 511-526.

Argyris, Chris. 1985. *Action Scienc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 Boal, Augusto, 1979, *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 Translated by Adrian Jackson, London: Pluto Press.
- Boal, Augusto. 1992. *Games for Actors and Non-Actors*. Translated by Adrian Jack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5, *The Rainbow of Desire: The Boal Method of Theatre and Therapy*, Translated by Adrian Jack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hung, Yung-Feng (鍾永豐), 1996, *Sociology and Activism: The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1992 to 1994*, University of Florida,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 Fals-Borda, Orlando, and Muhammad Anisur Rahman, 1991, In Walter Fernandes and Rajesh Tandon (eds.) *Action and Knowledge: Breaking the Monopoly wi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w York: The Apex Press.
- Feagin, Joe R. and H. Vera, 2001, *Liberation Sociolog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1976. *Literacy Report*.
- Freire, Paulo,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New York: Continuum.
- , 1985.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o Macedo, Granby, MA: 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 French, Joan, 1987, Organizing women through drama in rural Jamaica, In Miranda Davies (ed.), *Third Women, Second Sex*, pp. 147-154, New Jersey: Zed Books.
- Giroux, Henry A., 1985, Introduction, In Paulo Freire, 1985, *The*

- Politics of Education: Culture, Power and Libera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Macedo, Granby, MA: Bergin and
Garvey Publishers.
- Greenwood, Davydd J. and Morten Levin, 1998,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Hall, Budd, 1979, "Knowledge as a Commodity an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Prospects*, 9(4), pp.393-407.
- Hope, Anne and Sally Timmel, 1984, *Training for Transforma-
tion: A Handbook for Community Workers*. Gweru:
Mambo Press.
- Jackson, Adrian, 1995,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The Rain-
bow of Desire: The Boal Method of Theatre and Therapy*,
Translated by Adrian Jack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Lather, Patti, 1986, "Research as Prax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6(3), August.
- Latapi, Pablo, 1988,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The Albert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4(3), pp.310-319.
- Maguire, Patricia. 1987. *Doing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Feminist Approach*. Amherst, MA: Center for Inter-
nation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Miller, Leslie J. 1993. "Claim-Making from the Underside: Mar-
ginalization and Social Problems Analysis." In J. Holstein
and Gale Miller (eds.) *Reconsidering Social Con-
structionism: Debates in Social Problems Theory*, 349-376.
New York: Aldine de Gruyer.

- Park, Peter, 1989, "What I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MA.
-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ffir, William B. and Robert A. Stebbins (eds.). 1991. *Experiencing Fieldwork: An Inside 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Touraine, Alain, 1981, *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